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a light gray with abstract geometric patterns. In the top left, there are several overlapping circles and intersecting lines. In the top right, there are more circles and lines, some forming a grid-like pattern. In the bottom left, there is a large, fan-like shape composed of many thin, radiating lines. In the bottom right, there are more circles and lines, similar to the top right.

中国现代史

(上)

编者董原

目 录

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创立	1
“五四”前夜的中国	1
五四运动	16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	28
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 中国共产党的成 立	41
军阀的混战和政治争斗 中国革命运动的新发展	57
帝国主义的“协同”侵略 军阀的混战和政治争斗	57
资产阶级的改良思潮	71
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和中国工人运动的第 一次高潮	78
国共合作的酝酿	95
新文艺的成就和文化思想上的争论	104
北洋军阀势力的演变 国民革命运动高潮的掀起	119
国共合作正式建立和革命运动开始高涨	119
五卅运动和全国革命运动的高潮	139

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创立

“五四”前夜的中国

一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败

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一个多民族、地广人众、历史悠久而又富于革命传统和优秀遗产的国家。古代的中国，它的经济和文化，在很长时间内，在全世界处于领先的地位。只是在世界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以后，它才一步一步地落后了。一八四〇年爆发了鸦片战争。从此，英、法、俄、德、美、日、意等资本帝国主义国家，相继侵入中国。原来封建的中国，逐渐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帝国主义是封建势力的支持者，封建势力是帝国主义支配中国的主要社会基础。二者结合在一起，严重地阻碍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前者又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近代的中国革命，就是在这些基本矛盾的基础之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

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从鸦片战争反对英国侵略起，中经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维新、义和

团运动、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前夜，中国人民为了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压迫，进行了七十多年的英勇斗争。其中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是这期间出现的三次革命高潮。

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农民革命战争。它从一八五一年开始，前后坚持了十四年，革命势力扩大到十几个省，建立了号称太平天国的革命政权，沉重地打击了中国的封建势力和外国侵略者。但是，这次运动终于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镇压下失败了。一九〇〇年爆发的义和团运动，是一次以农民为主体的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它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野心，表现了我国劳动人民反帝爱国的高度热情和伟大力量。但是，它也被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联合进攻所扑灭。一九一一年由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是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最高峰。三民主义是这次革命的指导思想。它推翻了帝国主义的走狗清王朝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但是，辛亥革命也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革命果实很快被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所篡夺。中国人民仍旧处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和剥削之下。

从一八四〇年到一九一九年七十多年的反抗斗争，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使得帝国主义始终不能灭亡中国。但是，从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根本任务来说，这一系列的革命斗争又都失败了。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败，说明了中国的资产阶级没有能力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资产阶级

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行不通。

二 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

辛亥革命失败后，中外反动势力扶植起来的大独裁者袁世凯取代清朝，建立了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

袁世凯在一九一二年三月篡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位以后，残酷镇压革命民主势力，逐步建立独裁统治。一九一三年十月，袁世凯强迫国会选他为总统。随后，下令解散国民党和国会。一九一四年五月，他废除孙中山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公布反动的《中华民国约法》，改责任内阁制为总统制。一九一五年，为了取得帝国主义的支持，登上皇帝的宝座，袁世凯接受了日本提出的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十二月，他公然恢复君主制，自称“中华帝国皇帝”，预定在一九一六年元旦举行“登极大典”。袁世凯的丑恶行径引起了全国性的反袁风暴，他被迫宣布撤销帝制。同年六月六日，这个反动的政治怪物，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绝望地死去。

袁世凯恢复帝制失败后，帝国主义列强各自寻找和扶植一派军阀，充当自己的工具。北洋军阀分裂成几个派系，分别投靠不同的帝国主义。云南、贵州、广西、四川等地的军事头目，也各个拥兵自固，扩张地盘，成为地方军阀。中国出现了军阀纷争的混乱局面。这样又增加了帝国主义操纵中国内政的机会。在北洋军阀系统中，势力最大的是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因段是安徽合肥人，安徽简称皖）和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因冯是直隶今河北河间人）。皖系军阀长时间地掌握北京政府（名义上的中央政府），控制着安徽、山东、浙江、福建等省，并一再利用北京中央政权排斥异己，扩张地盘。直系军阀主要占有江苏、江西、湖北、直隶等省，经常联合反

皖势力，同皖系争斗。另一个大的派系是以张作霖为头子的奉系，割据了东北三省。直系军阀是英美帝国主义的走狗，皖系奉系军阀则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工具。此外，还有盘踞江苏徐州一带的张勋等。非北洋系的地方军阀，在北方有盘踞山西的晋系军阀阎锡山。在西南，最大的军阀是以唐继尧为首的滇系和以陆荣廷为首的桂系。前者盘踞云贵，后者占有两广。二者都接近直系，并与英美帝国主义有勾结。因为各派军阀无休止地争斗，它们控制的地盘常常变动，势力此消彼长。

袁世凯死后，副总统黎元洪继任大总统，而实权则操在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段祺瑞手中。一九一七年初，日本促使段祺瑞对德宣战，以便借此进一步控制中国。段祺瑞则企图借参战名义，得到日本的贷款，扩充武力，消灭异己，所以极力主张参战。背后有英美势力的黎元洪因害怕段派势力过于扩张，于己不利，反对参战，并解除了段的国务总理职务。六、七月间段暗中支持张勋复辟，赶走黎元洪。接着，段又实行“讨逆”，驱逐了张勋。由冯国璋继任大总统，段仍以国务总理名义总揽大权。段对内不再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企图用武力统一中国，对外于八月十四日对德宣战。

为了扩充实力，段祺瑞在宣战之后，公开或秘密地向日本大量借款，以出卖国家主权为交换条件。仅一年时间，段向日本借款即达五亿日元。一九一八年五月，日、段以反对苏俄为名，订立了《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使日本取得了在中国驻兵及战时直接指挥中国军队之权。大批日军以“共同防敌”为名开入“满蒙”。同年九月，段政府在山东问题秘密换文的卖国文书上，对日本霸占山东各项权利的要求，无耻地表示“欣然同意”。

南方的军阀为了抗拒段祺瑞的武力统一，维护自己的割据地位，先后宣布暂行“自主”。

在讨袁战争爆发后，一直逗留上海的孙中山，看到“张勋虽败，而段祺瑞等以假共和易真复辟”，提出打倒假共和、建设真共和的主张，号召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一九一七年七月上旬，孙中山南下广州护法。随后，受孙中山影响而脱离北京政府的海军也南下广州。孙中山在广州联合南方各省宣布“自主”的军阀进行护法活动。八月，孙中山在广州召集国会非常会议。九月成立护法军政府。孙中山任大元帅，陆荣廷、唐继尧任元帅。

对南方护法军政府，段祺瑞主张“讨伐”。一九一七年十月，段祺瑞派直系军队进入湖南，南方的军队也开入湖南对抗。但直系军阀则勾通南方军阀，主张与护法军政府和平解决，以排斥段祺瑞。十一月，段被迫辞职。但皖系势力仍然很大。同时南方政局也发生了变化。滇桂军阀与孙中山联合，本意是利用孙中山这面旗帜巩固自己的势力。直系主和之议一起，滇桂军阀便企图与直系妥协，排挤孙中山。一九一八年五月，孙中山被迫辞去大元帅职务，离广州去上海，护法运动失败。

段祺瑞辞去国务总理职务后，被任命为参战督办，并组织了以王揖唐为首的安福俱乐部。段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并勾结奉系军阀入关声援，迫使冯国璋于一九一八年三月又任命他为国务总理。段复职前，冯国璋已命令曹錕等进攻湖南。曹錕、吴佩孚取得了胜利，但段却任命皖系张敬尧为湖南督军。曹吴对此极端不满，便停止军事进攻。八月，吴佩孚等通电主和，南方军政府表示赞成。同月，冯国璋因受皖系排斥，以总统任期

已满为理由，自行辞职。九月，国会选举老官僚徐世昌为总统。十月，钱能训任国务总理，组织内阁。但北京政府实际上仍由段系把持。南方军政府初则反对北京的选举，接着也主张和平。一九一九年二月，双方代表在上海开和平会议，但随后就陷于破裂。

在军阀统治下，广大人民毫无民主权利，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军阀之间的连年混战更给整个中国社会和人民生活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和无穷的灾难。祸国殃民的军阀统治和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加紧侵略，不能不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中国正酝酿着新的革命风暴。

三 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工人阶级的成长

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欧美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一向被帝国主义压抑摧残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九年的六年间，中国资本新设厂矿共三百七十九家。以棉纺织业而言，一九一五年有工厂十二家，纱锭五十四万四千余枚。一九一九年工厂增加到二十九家，纱锭六十五万九千余枚。一九二〇年的本国棉纱产量比一九一二年增长三倍以上。再以面粉业而言，一九一四年以前，面粉每年都入超，从一九一五年起变为出超，一九一八至一九二一年每年出超二百万担到三百万担。全国面粉厂从一九一三年到一九二一年由四十多家发展到一百二十多家（其中有少数外国资本的工厂）。一九二〇年的面粉产量比一九一二年增长四倍以上。其它如缫丝、火柴、造纸、卷烟、肥皂、制革等轻工业也有了新的发展。重工业在半殖民地的中国是很难得到发展的，但在这一时期也有一定程度的增长。一九一七年上海成立了和兴钢铁公司，

一九一九年扬子机器公司在汉口设立炼铁厂。中国机械采煤量（帝国主义控制下的各矿产量除外），一九一三年为五十四万多吨，一九一九年增加到三百一十二万多吨。

但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并没有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和特点。第一，近代工业的发展，主要是在轻工业方面，重工业的基础非常薄弱。第二，在一些主要工业部门的投资总额中，外国资本的比重仍然大大超过本国资本。第三，封建经济在全国经济中仍占绝对优势。另外，在这一时期，日本帝国主义以惊人的速度扩展了它在华的经济势力。除了增加对中国的商品输出以外，日本垄断资本还在中国增设了许多新的企业。日本在华的企业投资，在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一九年间，由三亿八千多万日元增加到八亿八千多万日元。日本在中国的经济扩张，是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的巨大的压力和障碍。

随着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和外资企业的增加，中国工人阶级的队伍进一步扩大。中国的产业工人在一九一三年只有六十多万人，到“五四”之前，达到了二百多万人。中国工人阶级除了具有世界一般工人阶级的基本优点，即与最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富于组织性纪律性，没有私人占有的生产资料以外，还有自己特殊的优点。中国工人阶级人数虽不多，但很集中，在上海、天津、武汉、青岛、广州、大连、哈尔滨等大城市都集中了十万至数十万的工人，而且其中大部分又都集中在五百人以上的大企业中。这种高度集中的情况使它易于形成强大的政治力量。中国工人阶级身受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资产阶级的三重压迫，而这些压迫的严重性和残酷性，是世界各国中少见的。因此他们在革命斗争中比

任何别的阶级都更为坚决和彻底。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没有欧洲那样的社会改良主义的经济基础，所以除少数工贼外，整个阶级都是最革命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出身于破产的农民，和广大农民有一种天然的联系，便于在斗争中与农民结成亲密的联盟。所有这些，决定了中国工人阶级是中国革命的最基本的动力，决定了它必然会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

中国工人阶级从它诞生后，就不断地进行着反抗压迫者剥削者的斗争。随着工人阶级队伍的扩大，工人的斗争日益增长。据统计，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前，工人罢工一百零八次。特别是从一九一六年以后，罢工次数逐年增加。一九一六年罢工十七次，一九一七年二十三次，一九一八年增加到三十次，一九一九年仅一月到五月，即达十九次。在这几年内，罢工的规模、参加的人数和斗争的激烈程度，都大大超过了以前的罢工，形成自发斗争的高涨时期。

中国工人阶级在斗争中，逐渐提高了自己的阶级觉悟。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在较大规模的罢工斗争中，斗争锋芒往往指向帝国主义和军阀的统治。如一九一五年上海租界人力车工人的罢工，日资上海第五纱厂工人的罢工，一九一六年上海太古、怡和轮船公司船员的罢工，一九一七年上海英美烟厂工人的罢工，一九一八年上海日华纱厂工人的罢工，都具有反对帝国主义的性质。一九一五年湖南乾城大王岩煤矿工人的罢工和武装反抗，一九一六年北京政府财政部印刷局工人的罢工，都具有反对封建军阀的性质。一九一五年反对日本“二十一条”的抵制日货运动和一九一六年反对法国强占天津老西开扩大租界的斗争，是这一时期两次大规模的群众

性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政府的运动，上海、天津等地的工人都积极地参加了斗争。

在这一时期，工人在罢工中已开始互相支援，举行同盟罢工，并开始成立近代工会组织，这是工人运动的一个重要进步。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三年间，工人已经开始组织了一些比较原始的工会，但不久都被破坏了。一九一六年后，又重新成立了一些工会。在一九一七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的罢工中，工会组织还代表工人向资本家提出复工的条件，其中一条就是资本家不得干涉工会的活动。

以上所述，表明了中国工人阶级正在迅速地成长。领导中国革命的任务已经历史地落在了它的肩上。虽然，在五四运动前，中国工人阶级仍然是一个自在的阶级，还没有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政治舞台，还是作为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追随者参加革命的。但是，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和工人运动的发展，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建立工人阶级的革命政党，准备了阶级基础，为中国革命的新发展准备了条件。

四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随着中国民族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民族资产阶级日益迫切地要求摆脱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束缚。一九一五年后，民族资产阶级参加了反对日本侵略的抵制日货运动。而一部分努力探求改变中国现状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激进民主主义的知识分子，则在革命形势推动下，掀起了一个猛烈的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

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一九一五年九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他在创刊号发表的具有发刊词性质的《敬告青年》一文

中，历数当时中国社会的黑暗，提出了“人权”和“科学”的口号，要求青年大胆解放思想，敢于怀疑那些从来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陈腐观念，以求实进取的精神奋起自救。《青年杂志》自一九一六年二卷一号起改名为《新青年》。这个杂志联系了一批进步的知识分子，成为逐渐开展新文化运动的中心。

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是提倡民主和科学。民主指的是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科学主要是指自然科学和看待事物的科学观点和态度。陈独秀认为中国要脱离落后状态，“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

当时的激进民主主义者看到辛亥革命并没有在中国建立起真正的民主政治，因而大张旗鼓地宣传民主思想，反对封建专制。他们指出，中国欲图生存，必须抛弃“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易以“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而要真正实现民主政治，必须依靠全国大多数人的政治觉悟，自觉“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李大钊在一九一六年九月发表的题为《青春》的文章中，号召青年“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为“青春中国之再生”而顽强战斗。

新文化运动的宣传者们大力提倡科学。他们主张用科学态度对待传统观念和一切社会问题，排除虚妄迷信和盲从，打破“宗教上、政治上、道德上自古相传的虚荣、欺人、不合理的信仰”，以坚持真理的精神，树立“真实合理的信仰”。

辛亥革命失败后，伴随着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在文化思想领域里出现了一股尊孔复古逆流。因此，批孔便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突出的问题。一九一六年九月，康有为上书北洋军阀政府，要求定“孔教”为“国

教”，列入“宪法”，鼓吹以孔孟伦理为立国精神。为此，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连续发表文章，予严厉驳斥。他们指出：孔子是“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尊孔必将导致复辟。儒家伦理与民主政治是势不两立的，将“孔教”列入宪法，就是专制复活的先声。李大钊在一九一七年二月《甲寅》日刊上发表的《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一文，阐明一切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都是发展变化的，“古今之社会不同，古今之道德自异”。他坚定地表示：为了确立新道德，破坏旧道德，“虽冒毁圣非法之名，亦所不恤”。鲁迅是稍后投入新文化运动的，但他一出现便立刻成了反封建斗争中最彻底的思想家。一九一八年四月，鲁迅发表了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它无情地揭露了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大胆地指出中国几千年来封建社会的历史就是吃人的历史。鲁迅写了许多犀利的杂文，从各个方面对旧社会、旧礼教发动了攻击，尖锐地批判了形形色色的尊孔复古派、“国粹家”、“道德家”和遗老遗少们。吴虞等人也参加了反对封建礼教的斗争。

新文化运动的另一个方面的内容是文学革命。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他们力图通过文学革命，把向来宣传封建思想的旧文学，改造成为适合传播民主和科学的新文学。一九一七年一月，胡适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此后陈独秀发表了《文学革命论》，主张文学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内容上要进行一次革命，打倒“文以载道”和“代圣贤立言”之类的封建文学及“满纸之乎者也矣焉哉”的老八股。鲁迅的小说和杂文，出色地把反封建礼教的革命内容和白话文的形式结合起来，树立了新文学的典范，为新文

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新文化运动有着巨大的历史意义。它以磅礴的气势给了封建的专制主义、封建的伦理道德、封建的迷信和愚昧以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大力宣传了民主和科学，在思想界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中极大地破除了封建主义的束缚，这是我国历史上一次空前的思想大解放，这个思想解放的潮流，促使人们加紧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从而为中国的先进分子迅速接受十月革命的影响，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条件。这是时代的主流。在这同时，新文化运动也为各种各样的外国的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思想流派传播到中国，敞开了大门。

“五四”前的新文化运动也存在严重的缺点。由于这个运动的领导者和参加者的世界观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的，他们忽视甚至轻视人民群众，把运动只限制在少数知识分子的圈子里。他们虽然实际上在进行着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但在开始时却宣称“批评时政，非其旨也。”新文化运动没有普及到工农群众中去，没有同广大人民对军阀统治的不满和反抗结合起来，这就限制了它的实际效果。新文化运动的参加者认为中国文化一切都坏，西洋文化一切都好。这种形式主义看问题的方法在后来产生了不良影响。新文化运动所宣传的主要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个性主义，这在当时中国的历史条件下虽然有巨大的革命意义，但是已经不能充分满足人们的要求了。初期新文化运动不可能为中国指出一条真正获得解放的道路。

五 俄国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

正当中国工人阶级成长壮大，新文化运动蓬勃兴起

的时候，在俄国爆发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俄历十月二十五日），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在无产阶级伟大革命导师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用暴力推翻了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开辟了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新时代。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出现了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高潮，在西方和东方的许多国家里，爆发了无产阶级反对本国资产阶级统治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革命运动。

十月革命取得伟大胜利和俄国苏维埃政府宣布废除帝俄政府同外国订立的压迫别国的不平等条约的消息，很快传到了中国，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革命爆发后的第三天，十一月十日，上海《民国日报》就在要闻专栏内，以《突如其来之俄国大政变》为题，报道了“彼得格勒戍军与劳动社会已推倒克伦斯基政府”的消息。中国人民知道了，在俄国，工人阶级和主要是出身于农民的士兵掌握了政权，成立了“劳兵政府”。这个政府和迄今世界上任何政府都不同，它实行“最激烈之纯粹社会主义”。上述对于俄国十月革命的初步了解，构成了当时所说的“俄国式革命”这一概念的内容。中国人民从十月革命这一人类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中，获得了新的希望。开滦煤矿的工人希望“工人之国”早日到来。中国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孙中山，对十月革命表示了真挚的同情和欢迎。他指导下的《民国日报》，在一九一八年元旦的社论中说：“吾人对于此近邻的大改革，不胜其希望也”。一九一八年夏，孙中山曾致电苏俄政府和列宁庆贺他们的成功，并“希

望中俄两国革命党团结一致，共同奋斗”。

十月革命后，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立即起来学习、宣传和研究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从而在中国出现了第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者李大钊，在一九一八年七月、十一月，先后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论文。在这些文章中，李大钊阐述了俄国十月革命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区别，指出了这个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文章写道：“俄罗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它“非独俄罗斯人心变动之显兆，实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之显兆”。十月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世界人类全体的新曙光”。“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布尔什维主义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布尔什维主义的凯歌的声”。“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十月革命和世界革命运动的高潮，使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看到了工农劳动群众的伟大力量，因而他们开始改变对人民群众的看法，逐渐认识到要真正改变中国社会的现状，必须发动广大的工农群众起来进行革命斗争。这种认识在五四运动前李大钊发表的论文中，已经明显地表现出来。他在《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中，指出军阀、官僚、贵族等一切旧势力都将在群众运动的潮流中被淹没。李大钊初步提出了知识分子同劳动群众相结合的思想，指出要改造中国社会，“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号召革命知识分子到最受压迫生活最痛苦的工农群众中去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培植革命力量。

不仅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和群众运动的重要性，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对劳动人民的看法上也有所改变。一九一八年三月，在中国第一次出现了以《劳动》命名的杂志。同年十一月，著名资产阶级教育家蔡元培在一次集会的演说中喊出了“劳工神圣”的口号。

十月革命和当时世界各国不断爆发的大规模游行示威、同盟罢工和武装起义等群众革命斗争的方式，强烈地吸引和感染着中国人民。人们深切地感到要摆脱被压迫的屈辱生活和拯救国家的危亡，必须由人民自己起来“直接解决”。陈独秀以前是看不起人民群众，也不注意群众性的革命运动的，这时他也看到了发动群众进行直接斗争的必要性。他在一九一九年初发表的《除三害》一文大声疾呼，号召国民起来，去同危害国害民的军阀、官僚、政客进行斗争，认为“对于这三害要有相当的示威运动。”《每周评论》的某些文章也强调人民自己起来采取直接的行动，主张“叫民众亲自解决政治问题。”

十月革命的胜利，显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从十月革命的光辉实践中，中国人民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锐利的思想武器。从一九一八年到五四运动前，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已经开始传播。在这一时期，李大钊连续发表文章，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他在解释什么是布尔什维主义时指出：“他们的主义，就是革命的社会主义；他们的党，就是革命的社会党；他们是奉德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马客士（按即马克思）为宗主的”。他组织“马客士主义研究会”，集结了一些进步青年，学习和研究马克思